

从《上海通志》到《上海通史》——一个城市的史学史

上海开埠后广东帮与宁波帮的竞争

上海道台与晚清政治社会

清末上海的文化张力与「双视野人」

权力的分配与平衡：清末上海的城市政治和社会精英

海上天风：早期上海基督教的传播及其影响

上海中西书院考略：一个教育理想的创建与幻灭

凝观与反照：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星沪之间两本游记的解读

津沪联系：李鸿章对上海的政治控制

体制内的变革：清末上海的「局」

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



晚清上海

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梁元生 著



晚清上海

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養陽—中氣虛—市鹽土①、Ⅲ—一第①、Ⅱ—一第①① 梁元生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本书简体字版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印行和出版,版权所有,不得翻印。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0-16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清上海: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 / 梁元生 著. —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633-9870-6

I. ①晚… II. ①梁…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研究—清后期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7733号

总 监 制:郑纳新
组 稿:竺金琳
责任编辑:刘 鑫
装帧设计: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31260822-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50mm×960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00千字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3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659)

献给家中各人，
因为他们为这本书所付出的比我更多！

自序

我对近代上海历史发生兴趣,可以追溯到三十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念研究院的时候。那时我醉心于中国近代史,但学不专纯,好多务杂,而尤喜欢读野史稗史。其后得王师德昭指导,才较为专心学习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并在此一范围寻找硕士论文之研究题目。硕士研究两年的成果,便是我的第一本学术著作《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林乐知(Young J. Allen)是19世纪中叶由美国到中国去宣教的传教士。他的大半生都在上海度过,主要是传教、兴学和办报,也间接参与清末的洋务运动及百日维新,对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变及现代教育、出版业的发展与推广有很大的贡献。本书中的一篇有关林氏创办中西书院的文章,就是从当年的研究衍生出来的。

研究林乐知对我个人的学术之路影响甚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另一方面就是上海研究。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以及其在近代中国历史行程中所引起的一些重要课题,我写过多篇文章讨论和分析,收入《十字莲花——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论集》(香港: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2004)一书中,已由香港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出版。至于上海

研究,更成为我此后三十年努力耕耘、协助开发的一个学术范围。

1970年代当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便选择了《上海道台研究——转变中社会之连系人物》作为题目进行深入的研究,师从徐中约教授。徐师是宁波籍的上海人,对上海旧事非常熟悉,偶有提及;其后随他访沪,他介绍我认识一些研究上海历史的前辈,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唐振常先生,就是徐师当年的燕京大学同学。然而,其时中国内地的上海研究队伍尚未成形,资料也还没有经过系统的搜集和整理,而且不对外开放,所以我当时为了研究上海,只能跑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及洛杉矶校区的图书馆,以及远赴英国伦敦的公共档案馆去寻找资料和翻阅文献。

197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专业研究上海史的人也不多,故此我当时颇有道上孤单的感觉,没想到二十年下来,上海研究竟会变成全球关注的一个学术热点。如今在中国各地大学都有研究上海的专家,世界各地都有研究上海的学者,尤其是日本和美国,研究上海历史、文化及经济各个方面的都大有人在。其中因由,我在本书的第一篇文章《从〈上海通志〉到〈上海通史〉——一个城市的史学史》中做了较详细的分析。

本书内的其他各篇文章,多数是近几年累积的研究成果,先后在不同的学术会议及刊物上发表过,如上海的《史林》、台湾的《汉学研究》,以及美国的《清史问题》等,在此一一致谢。此外,《上海道台与晚清政治社会》一文,由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陈同译自我的英文专著《上海道台研究》(*The Shanghai Taotai: Linkage Man in a Changing Society, 1843-1890*)(新加坡大学出版社及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0)的第二章,也谨此鸣谢。

这些文章虽然在不同时期写成,看起来好像没有一个整体的系统,但实际上在这些论文的背后,我是有一个总体的构思的,那就是:

以上海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在其走向现代的历史行程及急剧变化之中,传统的“公共空间”也相应地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本书以“衙门”(以上海道台为中心的道署)、“会馆/公所”、“局”、“堂”等作为考察的对象,分析新旧、中西、传统与现代、本地及外来各种力量给这些“空间”带来的变化,希望借此对晚清时期中国近代城市的转型有一个较为新鲜的看法。

最后,本书能够出版,还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金观涛教授。本书能被收入到他主编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专刊,实感荣幸。此外,李慧娆、罗燕妮、叶子菁小姐帮忙校正及整理书稿,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梁元生

二〇〇八年

目 录

自 序	1
一 从《上海通志》到《上海通史》—— 一个城市的史学史	1
二 上海开埠后广东帮与宁波帮的竞争	21
三 上海道台与晚清政治社会	37
四 清末上海的文化张力与“双视野人”	71
五 权力的分配与平衡:清末上海的 城市政治和社会精英	93
六 海上天风:早期上海基督教的 传播及其影响	121
七 上海中西书院考略:一个教育理想的 创建与幻灭	141
八 凝观与反照:19 世纪 80 年代星沪之间 两本游记的解读	159
九 津沪联系:李鸿章对上海的政治控制	173
十 体制内的变革:清末上海的“局”	187
十一 慈惠与市政:清末上海的“堂”	207

一 从《上海通志》到《上海通史》

——一个城市的史学史

一 绪言:20 世纪的两次“上海研究热”

近百年来上海一直是中国的商贸之都,也是全国最为现代化的城市。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中,它占着一席非常重要的位置。同时,它本身的历史与文化也自有其独特的色彩。作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火车头,上海一直是中国吸收新知识、引入新事物和推动新思潮的中心城市,也是中国走向西方和走向世界的窗户。东方和西方在此相遇,传统与现代于此并融。同时作为华东地区江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也有历史深远的地方传统。到了近代,商旅辐辏、移民云集,又带来了各地文化和移民社会的特色。所以,无论从宏观式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去观察,或是从微观式的地方史及城市史去审视,上海都是一个极为有趣而又值得研究的地方。

国人及外人对于上海的兴趣,一直都存在着。旅行者的记录、地理家的观察,零简片章,所在常见。自从上海开埠之后,这种游记和掌故式的资料尤多。不过,有意识、有规模、成为热潮而又有集体成就的上海史研究,则在过去一百年来,仅有两次而已。一次在 20 世纪初期的 20 年代末到 30 年代初,另一次则在 20 世纪晚期的 80 年代

到 90 年代末。第一次上海研究热潮主要由国人,特别是由上海人来推动,可以说是本土意识在面对急剧的国际化和社会变动下的一种文化反弹。第二次的上海研究热潮也有一定的上海学人参与,但研究队伍却更为多元化和国际化。除国内学者外,尚有许多外国学者参与,包括英、法、美、德、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其中尤以法国和美国方面的“上海学”研究队伍人数繁多,成绩也较为出色;而且这些外国专家与中国国内研究上海的学者互动频繁,有许多互助及合作的关系。因此,这次世纪末的“上海热”,可以说有着本土与国际合作,以及中西共融的文化特色。

二 1930 年代的上海研究:上海市通志馆和上海通社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的一次大规模的上海研究热潮,主要是由上海市通志馆及上海通社的一批工作人员去推动的。这次“上海热”最显著的成绩就是发表了一大批有关上海研究的学术文章,分别刊载于《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及收录于《上海研究资料》和《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两书之中。当然,在此以外,也有集体的研究如《上海通志》的编纂、上海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等等。^①

上海市通志馆是南京中央政府辖下的机构,是一个官方组织;而上海通社则是个民间团体,由一群对上海研究有兴趣的学术人员组成。不过,两者的成员重叠,并且工作与研究的范围相近,故一位与这两个组织有密切关系的人如此说:“讲句老实话,上海通社和市通

^① 关于上海市通志馆的历史背景及工作,参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 1 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页 168—171。

志馆的关系[一官一民、一公一私],正是孪生的姐妹呢。”^①

上海市通志馆于1932年7月15日成立。但在1930年6月上海市政府就发表了通志馆的组织章程,规定编纂人选的标准;翌年,上海市通志馆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由上海市市长张群任主席。筹备一年,通志馆在1932年始正式成立。^②南京政府中央委员柳亚子被委任为馆长,负责组织编辑部,并由政府拨款,负起兴修上海第一部市志的工作。上海市通志馆除馆长柳亚子外,高层人员还包括:副馆长朱少屏和编辑主任徐蔚南。编辑部共有人员十一名,除主任徐蔚南外,其他人员还有吴静山、胡怀琛、徐遽轩、蒯世勋、席涤尘、蒋慎吾、李纯康、顾南农、郭孝先和胡道静。通志馆的馆址设于法租界的萨坡赛路(今之淡水路)二百九十一号,其主要任务是编撰《上海通志》。

在柳亚子的带领下,编辑部人员很快就展开了工作,把《上海通志》分成二十五编,包括上海市的历史沿革、政治、外交、租界、金融、社会事业、教育、学术团体、出版刊物等等,每编约十万字,计划两年成稿,一年修订,共三年完成。^③《上海通志》的初稿由于资料浩繁,整理需时,多花了点时间,在抗战前完成了十一编,可惜由于日本入侵中国,近千万字的稿本未能实时付梓,到许多年后才有机会面世。

《上海通志》虽然未能在1930年代出版,但通志馆的人员仍然创造了一次大规模的上海研究热潮。除了上面提到的上海市通志馆人员之外,参加这次“上海热”研究队伍的,还有不少文人、报人、学者和法律专家。学术研究及文字讨论的园地主要有《上海市通志馆期刊》以及在《大晚报》上连载的《上海通》周刊。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上

① 柳亚子语,见《上海研究资料叙》,引自张明观:《柳亚子传》(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页362。

② 熊月之主编:《上海通史》,第1卷,《导论》,页169。

③ 张明观:《柳亚子传》,页359。

海通社编的《上海研究资料》及《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之中。《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由通志馆编辑及出版,1933年6月创刊,至1935年3月,一共出版了四期,但每期篇幅很长,内容也非常丰富,有学术论文,也有史料钩沉和掌故旧事;后来一部分文章更印成专书出版,包括《吴淞江》、《上海的风雨》、《上海的银行》、《上海的日报》、《上海图书馆史》、《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的文艺团体》、《上海在太平天国时代》、《关于上海的书目提要》,以及《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等。^①除了《上海市通志馆期刊》外,通志馆也从1935年开始每年编纂和出版《上海市年鉴》,到抗战爆发乃止。

上海通社则是一个研究上海史的学术团体,成立于1934年1月。其成员大多数为上海市通志馆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它的发起人是通志馆的编辑主任徐蔚南和吴静山。其他社员也有很多来自通志馆,所以不少人误会它是属于上海市通志馆的一个组织,但事实上各个成员均以馆为公,以社为私,体制区分甚明。社员都是研究上海的,他们搜集资料,撰写文章,每星期一发表在《大晚报》的《上海通》周刊上,稿费捐公,作为上海通社的基金。

上海通社社员在《上海通》周刊上写稿,关乎上海掌故历史者最多,也有关于社会政治、自然地理和人物传记的。通社社员所写有关上海的文章,皆以学术性及科学性为标榜,自言“以客观的立场,用科学的方法整理上海历史、研究上海文化”。《大晚报》总编辑曾虚白(父曾朴)说:“‘上海通’[的文章]……没有一句没来历,没有一字没根据。”^②后来这些文章集而成书,即《上海研究资料》及《上海研究资料续集》共两巨册,各约四十万字,分别于1936及1937年出版。此

① 张明观:《柳亚子传》,页362。

② 曾虚白:《曾序》,载上海通社编著:《上海通研究资料》(上海:上海通社,1936;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2年重印),页1。

外,上海通社也收集、整理及出版上海史料多种,名为《上海掌故丛书》,第一集十册,由胡朴安主编,包括:元陈椿《熬波图》,明张鼐《吴淞甲乙倭变志》,清叶梦珠《阅世编》,杨光辅《淞南乐府》,褚华《沪城备考》、《木棉谱》、《水蜜桃谱》,张春华《沪城岁事衢歌》,曹晟《夷患备尝记》、《红乱纪事草》、《觉梦录》,黄本铨《泉林小史》,王萃元《星周纪事》,以及曹骧《上海曹氏书存目录》等文献十四种共三十一卷。^①

一些研究上海的学术专书,也陆续在1930年代出版。如徐公肃、丘瑾璋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②及蒯世勋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③等,皆成书于此时期,其中书内数章已先在《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或《大晚报》之《上海通》周刊上发表过。此外,尚有胡林阁、朱邦兴、徐声合编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④,也是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不过,上海市通志馆及上海通社的人员,似乎表面上都在为国民党工作(不论是为国民党左派或右派),唯独这本《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却是在共产党指示下完成的一个调查报告。^⑤

1930年代的“上海研究热”,并非兴之所至突然发生的知识运动。其所以勃兴于其时,实有着一些特别的历史因素。根据上海史研究前辈唐振常的解释,有两个背景值得我们注意:首先,是“五卅”

① 熊月之主编:《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269。

② 徐公肃、丘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原书刊于1933年,现收入“上海史资料丛刊”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页1—297。

③ 蒯世勋编著:《上海公共租界史稿》,收入《上海公共租界史稿》,页299—588。

④ 胡林阁、朱邦兴、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香港:远东出版社,1939;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年重印)。

⑤ 同上,《前言》,页1。

事件带来的爱国热潮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促使许多国人要求重新认识中外关系,要求重新确立上海在近代中国与西方之间的角色。唐氏认为:此时期的一个研究焦点在于“租界”,其目的就是要了解西方侵华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的不合理,维护中国人民的权益,为收回租界主权的主张提供理论依据。^①

当然,这样的解释不能完全说明 1930 年代的“上海研究热”,因为“反帝”及“租界”的讨论也可以用其他沿海城市和条约口岸作为焦点。但诚如唐氏所言,当时许多学者都关心帝国主义侵华及租界主权收回问题,例如王揖唐的《上海租界问题》,徐公肃、丘瑾璋的《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以及蒯世勋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稿》等皆是。他们的著作及研究,其实主要是针对 20 世纪初期出版的一些关于上海的西文著作的。这些书籍把上海租界描述成“模范社会”或“模范社区”(model settlement),夸大了西方列强入侵对上海发展的积极作用及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例如戴斯(C. M. Dyce)所著关于上海租界的书,书名就叫做 *The Model Settlement: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irty Years' Residence in the Model Settlement Shanghai, 1870-1900* (《模范租界》,伦敦,1906)^②,其他像裘昔司(C. A. Montalto de Jesus)的 *Historic Shanghai* (《历史上的上海》,上海,1909)、盖慕伟(Mary N. Gamewell)的 *The Gateway to China: Pictures of Shanghai* (《通向中国的门径》,纽约,1916),以及梅朋(Charles B. Maybon)和傅立德(Jean Fredet)合著的 *Histoire de la 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Shanghai* (《上海法租界史》,巴黎,1929)等书,皆对外人在上海的建设和业

① 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页 124。

② C. M. Dyce, *The Model Settlement: Personal Reminiscences of Thirty Years' Residence in the Model Settlement Shanghai, 1870-1900* (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906).

绩,多有美言。

较为有名的两本以英文写作的上海史,即蓝宁(George Lanning)和库寿龄(Samuel Couling)合著的*The History of Shanghai*(《上海史》,上海,1923)及卜舫济(F. L. Hawks Pott)写的*A Short History of Shanghai,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上海简史》,上海,1928),虽较为客观,但仍然从“西方带进文明”这样的观点出发和立论。在“五卅”之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这种论调对中国知识分子造成一定的冲击。可以说1930年代发生的“上海研究热”,相当程度上是从爱国意识出发,企图从学术研究上反对及纠正这个错误而流行的迷思。

另外,唐振常认为:1900年以后上海成为中国的工业中心和繁华商港,是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因此中国学者需要认识和理解上海的发展过程,思考上海进一步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他说:“三十年代国民政府的‘大上海建设计划’,既是上海史研究的某种体现,也对上海史全面研究的展开有推波助澜的作用。”^①毫无疑问,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都会,也是一个世界瞩目的国际城市,学者的关注和对地方史兴趣的增加,合力造成一股研究热潮。

虽然日本侵华的战火和后来国共两党的内战,都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和伤害;然而,由193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这半个世纪中,上海研究还是断断续续地在中国及国外继续进行。在西方,更出现了研究上海的专业史家和学者如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及密歇根大学的墨菲(Rhoads Murphey)等,他们用新的史学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去分析和处理上海的历史,虽标榜客观,却也并非毫无成见。费正清在其留华期间(1934—1935)已开始注目上

① 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页181—182。

海,研究主要集中于上海开埠时期的外交和政治变动,他所写的数篇英文论文发表在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这份学术期刊中,后来收入其大作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中国沿海之商业和外交》)一书内,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① 墨菲的书,亦于同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是一本从人文地理立场出发,较有系统性的研究上海的专著,名为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此书到现在还为许多人时常引用,1986年还出版了中文译本,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②

与此同时,以研究上海历史闻名的外国人还有日本的外山军治(Tōyama Gunji)和根岸佶(Negishi Tadashi)。前者着力于研究上海开埠后的发展,尤其是绅商和官员的关系,论文有《上海道台吴健彰》及《上海の绅商杨坊》,发表在《学海》及《东洋史研究》中;后者的大作为《上海のギルド》(《上海的行会》),对早期上海各商会的历史有相当详细的介绍和调查。^③

至于中国学者的上海研究,在抗日战争后及1980年代前这段政治动荡时期,由于客观条件不好,成绩当然受到限制,不过也并非全无建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1950、1960年

① John K. 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1842-185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② Rhoads Murphey,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墨菲(Rhoads Murphey)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③ 两位日本学者的著作,外山军治的文章,见《学海》(南京),第1卷第7期(1944),页45—54;《东洋史研究》(东京),新第1卷第4号(1945),页17—34。根岸佶:《上海のギルド》(东京:日本评论社,1951)。

代中国学者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例如编辑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史料》(1958)、《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1958)、《上海钱庄史料》(1960)、《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1843—1863)》(1961)、《荣家企业史料》(上、下册,1962)、《上海民族毛纺织工业》(1963)、《永安纺织印染公司》(1964)、《上海民族机器工业》(1966)等等。1949至1976年间中国国内的学术研究备受政治干扰,学者们能够做的多数是编纂资料和整理史料的工作。至于在香港和台湾的学者,则有比较大的论述空间,可是此时期对上海研究特别有兴趣的学者却为数不多。

三 1980年代以来的上海研究热潮: 《上海通史》的编纂和出版

在1980年代中国国内的第二次“上海研究热”还没有兴起之前,国外学者对上海史及上海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的下列数位,可以作为国外不同地区研究上海的代表人物。首先是英国牛津大学的伊懋可(Mark Elvin),他在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就研究上海,在牛津大学写成的博士论文为“The Gentry Democracy in Shanghai, 1905-1914”(《上海的士绅民主》),^①节本收入格雷(Jack Gray)主编的*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近代中国对政治体制的寻索》)一书之中。^②他虽然没有一本研究上海

① Mark Elvin, “The Gentry Democracy in Shanghai, 1905-1914” (Ph. D. Disser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1967).

② Mark Elvin, “The Gentry Democracy in Chinese Shanghai, 1905-1914”, in Jack Gray ed., *Modern China's Search for a Political For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41-65.